

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

[美] 斯蒂文·贝斯特 著
道格拉斯·凯尔纳
张志斌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后现代理论》导读

王治河

《后现代理论》一书,是我所读过的研究、评介后现代理论的著作中立场比较客观的优秀之作,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甚至再读的学术专著。

该书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严谨的态度,其二是信息量大。

所谓严谨的态度,一如书的副标题‘批判性的质疑’所昭示的那样,就是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这一点说起来平淡无奇,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众所周知,对待后现代主义这一20世纪末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盲目地全身心拥护,不加分析;一种是专断地嗤之以鼻,拿起来就骂。这两种貌似截然对立的态度实则为一,都

是一种思想懒汉的态度。《后现代理论》一书的作者则舍弃了这条便利异常的路,而踏上了一条远为艰难的路,一条思想之路。在书的第一章结尾处,作者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去阐述和理解后现代理论,把它看作是对现代理论与现代政治的一种挑战,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得怀疑的向度。”又说:“我们既不当后现代话语的辩护士和颂扬者,也不会对之仅抱以轻蔑和鄙夷,相反地,我们将敞开胸怀,既接受它的挑战与批判,同时对它的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提出质疑。”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作者不同意仅仅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一种‘时尚’,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得以产生和风行的现实依据。作者的考察表明,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是对西方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失败的反应。此外,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一日益复杂的世界,传统的一套认识模式与范畴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局限性。人们呼唤着新的理论、新的价值观的产生。后现代理论便是应这个‘运’而生的。如果说在后现代主义刚刚兴起的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还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的话,那么今天,诚如作者所言,许多社会、文化领域都已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客观上就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等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参见本书第41页)。其结果就是“后现代不仅已经介入我们所能设想的从人类学到企业管理到政治到科学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后现代总统制”、“后现代爱情”、“后现代心灵”、“后现代神学”、“后现代电视节目”等一系列当代大众文化的各种不同主题之中(参见本书第36页)。

面对这样一股扑面而来的思想大潮,作者表现出异乎寻常

的学者的冷静与激情。

他们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后”（4378）这个字样所包含的表示某种旧事物终结的否定性的含义，同时也应该对它所包含的另一种启示录式的含义——新东西的诞生——引起注意。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者在书中始终拒绝偏执与独断，尊重多元与差异。

也正因如此，作者对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表赞同。针对资本主义对人的麻醉化、机械化，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人的创造性，强调与那些要求僵硬的中心性、权威、稳定性以及顺从性的（偏执狂）人格类型进行对抗的重要性，因为这种主体（人）不能忍受他人的差异并且很容易走向法西斯主义。

同样，对于尼采的对现象采取多种视角要比“单眼式”主义视角更能提供丰富的进路的视角主义的多元论思想，作者也是首肯的。运用这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方法，作者一开始便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内部的差异，注意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歧义性和多样性；既区分了后现代主义的两翼——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重建的后现代主义，也注意到某些激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具有的建设性的思想，甚至对同一个后现代理论家早期、中期、晚期之间的差异也一一加以甄别，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既注意它们的理论缺陷，也留心它们所蕴涵的带有原创性的有价值的观点，从不作笼统之论，更不发无根据的片面之言。对博德里拉的分析便是突出的一例。

我们知道，博德里拉的后现代理论是后现代思潮中最激进的一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意义的消解。据说后现代世界里没有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理论在虚空中飘荡，无法定泊于任何安稳的港湾，“凡生于意义者，已死于意义”。博德里拉

宣称：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穷尽了自身，世界已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而‘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一些人也就据此对整个后现代主义大加讨伐，似乎后现代主义带给人们的除了‘玩世不恭’就是‘绝望’。殊不知，博德里拉的后现代主义仅仅是后现代主义众多形式中的一种，而且是最为极端的一种。即使博德里拉这位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仍期望着能有更具独创性的解决方式（见本书第四章）。其实，博德里拉没有说清楚的是，后现代讲的‘意义的消失’主要指的是旧的意义的消失。这种旧的意义是与“不变的本质”、“隐藏的深度”、“永恒的基础”、“绝对的真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这些“本质”、“深度”、“基础”、“真理”瓦解了，依附在它们身上的‘意义’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然而，旧的意义不存在了并不意味着新的意义永不再来，更不意味着意义本身不存在了。

事实上，绝对真理的‘烤松鸡’从来都是不存在的，那只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个虚构。这一点马克思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早已讲得很明白。相应地，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意义’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变化中的意义。当然像博德里拉进而断定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里一切都是无聊的、外显的、透明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个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里，有人“无聊”，就一定有人在踏踏实实做着‘有意义’的事情。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博德里拉的问题，也可以说博德里拉的‘忧郁’或‘绝望’来自他的思路的片面性，用通俗的话说，来自他的形而上学。具体地说，来自他割裂了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主张要与过去彻底决裂，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剧变式’的断裂），来自他将自己洞察到的某种局部的社会现象（计算机高科技领域信息符号的爆炸）不适当地外推为一种普世化的社会

文化模式。

换一个角度看,博德里拉又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作为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一个率先研究高科技社会的理论家,在举世为计算机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额手相庆的时候,他却看到了计算机已带来和将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并及时为我们发出了预警。仅此一点他已担当起思想家“为人类操心”的天职,因此理应赢得我们的尊敬。对此《后现代理论》的作者也是首肯的。尽管作者对博德里拉多有不满,对他的许多思想和说法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尖锐批评,但仍能客观地厘清他早期、中期、后期思想的不同,特别肯定了他大部分早、中期研究的价值,认为他所建立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说明当前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发展。即使对他后期的思想,作者也没一棍子打死,而是坦诚地提供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方向,有助于发展出一种包容广泛的、处理历史新纪元的后现代理论(参见第四章第3节)。

该书的另一大优点是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该书将焦点集中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博德里拉、杰姆逊、拉克劳以及墨菲等在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上,特别是对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与政治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分析。

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辟出了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初步揭示了它们之间既对立又亲合的关系。这一切在为各种思想流派与后现代主义对话提供了广阔的对话场域的同时,也为有志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标出了某种进路。

关于书中所论及的这些后现代理论家的后现代理论的具体内容,志斌已花大力气一一为我们翻了出来,这里就不赘述了。唯一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作者视角的局限。尽管作者一再推崇多视角、多向度看问题,但作者对政治理论的偏重(这或许与他们的专业和政治倾向有关),使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现代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激进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对于后现代主义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则所论不多。虽然不能苛求作者,但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个缺憾。此外,对于也同样活跃在当今西方思想界的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詹克斯和福洛克等人的“重构的后现代主义”,该书也鲜有论及。这可看作是该书另一个缺憾。相信该书再版时作者一定会考虑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新发展的。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学者,而虚怀若谷是学者的美德。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真正的高水准的学术著作。这次受志斌之托重读此书,更增进了我对作者们的敬意。尽管作者将自己归类于无法认同“后现代”的旧时代,但学者毕竟是学者,真正的学者永远是受尊敬的,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

1998 年元月于北师大励耘楼

英文版前言

一切皆支离破碎，所有的一致性均已不复存在。

——约翰·多恩

无物常存，无论是在我之外，还是在我之内，所有的只是永不停息的变化。我无从知道任何存在，甚至包括我自己。世间无物存在。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且什么也不是。世间唯有想像；它们是唯一的存在，它们以想像的方式认识自己……我本人也只是这些想像中的一种。

——费希特

不难看出，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乃是一个行将分娩的时代，一个向新纪元转变的时代

……搅扰着既定秩序的无聊与烦躁,关于某种尚未知晓的事物的朦胧征兆,所有这一切都是变化即将来临的前奏。

——黑格尔

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如今都已被分离;娱乐同劳作分离,手段同目的分离,努力与报偿分离。人被永久地系绑在社会整体的某个独立而微小的片断之上,他自己也变得不过是个片断;日复一日地操弄着机器的齿轮,耳畔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

——席勒

在社会的脚下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不再有固定不变的事物……由此,人们在某种政体中看到了属于混沌现象的持续变迁性和不稳定性。我们从中获得存在的这个社会,乃是一个支离破碎、步履蹒跚、精疲力竭的社会,随时都有可能被一场不期而至的风暴所摧毁。

——埃·涂尔干

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曾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的瓦解,常常会引发广泛的社会不协调感、破碎感、混乱和无序感。由此引发的反应常常表现为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并拼命地去找寻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

上面引用的多恩、费希特、黑格尔、席勒和涂尔干等人的话语表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曾被体验为了一场危机,需要

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已被人们认识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就此而言,理论话语可以解读为对历史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对动荡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反应,以及对由先前稳定或熟悉的生活和思维模式的解体而引发的社会 and 知识骚乱的反应。新理论和新观念阐述了新的社会经验,因而,新兴话语的激增意味着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

60年代遍及西方的社会政治运动、新思潮和文化反叛,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战后那种众口一词地歌颂“富裕社会”(ξππ09σ2873π(σ83))的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使人感觉到严密的、压迫性的现代社会正在遭到普遍的反叛。60年代的激进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实践、文化及思维模式提出了怀疑。尽管这个时代的激进的政治运动最终烟消云散,未能如许多人当初所设想的那样,在1968年的骚乱事件之后继续掀起革命的巨澜,但是,发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却表明,与先前社会的决裂确实已经发生。媒体、电脑及新技术的爆炸、资本主义的重新调整、政治的激烈变动、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时空经验形式等等,让人们感觉到文化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而,当前的后现代争论可以被部分地解释为是由“现代”社会组织模式的瓦解,以及新的、尽管尚不能清晰描绘的“后现代”世界的降临所引发的一系列持续且强烈的危机所引致的。从这一点看,ϵ.福柯、γ.德勒兹和T.加塔利,Σ.拉克劳、Π.墨菲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乃是在表述某种新的观点,借以描绘他们所谓的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并发展新的理论模式、写作模式、主体性模式及政治模式。在本书中,我们将梳理并评估这些自诩为最新的理论和政治前卫、比激进更激进、比新更新、超激进的和超新的观点的贡献与局限。

尽管我们本书讨论的作者们各自发展着完全不同的方案，但是他们都批判了影响着现代社会理论、历史理论、政治理论及个人理论的、占主导地位的目标和假设并与之决裂，转而拥抱各种新的原则和新的侧重点，就此而言，他们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尽管“后现代理论”这种提法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后现代批判直接与“理论”概念本身相抵触——理论这个词暗示了一个系统地发展起来的、以事实为根据的概念结构——但是，被我们划归到后现代标题之下的这些作者还是就各种不同的主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将通过“批判性的质疑”这种办法来评估这些立场对发展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的贡献，并指出它们的不足。我们意欲建立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同这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一方案将以我们早期的著作（见参考书目）为基础，并将在本书的质疑过程中逐步展开。

我们怀着由衷的心情感谢麦克米伦（ $\epsilon \xi \pi_1 \chi_0 \xi_2$ ）的一位不知名姓的读者以及斯蒂芬·布鲁纳、哈里·克利弗、查克·艾普、O. 费尔兹、 ϱ . 甘斯曼、 ∂ . 格劳斯伯格、 $\exists$. 霍塞尼、 ϕ . 拉马哈、 ϵ . O. 曼德、 s . 麦克唐维尔、 ∂ . 尼科尔逊、 Σ . 诺耶、 ϱ . 罗帕罗、O. 施路德、 Π . 斯蒂威尔、 P . 维斯、 Σ . 维斯特科等人对本书观点的讨论及对初稿的批评，感谢德克萨斯州大学1989年春秋季后现代理论研究组及研究班的成员对本书的构思及初稿写作的帮助。感谢 Ω . 海—柔协助处理庞杂的电脑事务。感谢 Ψ . 伯恩纳斯、 α . 登顿及得克萨斯州大学1990年秋季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班的成员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 s . 肯尼迪和 P . 琼斯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劳动，以及 Ω . 波维提供的编辑服务。我们要特别感谢 ϱ . 安东尼奥先生给我们的支持和友谊，

他阅读和评论了全部手稿,并和我们一同讨论了写作计划。

谨以此书献给下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和行动主义者,愿他们能利用后现代理论及别的批判话语所提供的洞见,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政治,以迎接当前十年及下一个世纪的挑战。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

第一章 后现代理论探源

过去20年来,后现代争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在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围绕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是否已经终结以及何种后现代艺术将取而代之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哲学方面,在关于现代哲学传统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上爆发了争论。同时,许多人已开始向一种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相联系的新的后现代哲学欢呼了。其结果是,这种后现代冲击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而且也产生了对后现代现象本身的多面性加以界定的理论意图。^[1]

后现代转向的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理论和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面对这个新的挑战

者,现代传统的维护者们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是置之不理或起而反击,要么是试图对其作出妥协,并吸纳他们的新话语($\rho\chi\pi^{3.967}\sigma^7$)和新观点。后现代转向的批评者们认为,这一转向既是一种片刻狂热(T^3 , 1986/7; $\gamma^9\xi^{88}\xi^6\chi$, 1986),一种寻求文化资源新话语和新源泉时知识分子的华而不实的虚构($O^6\chi^{8832}$, 1988),也是企图贬损解放性的现代理论与价值的又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hi\xi o\sigma^6\text{ }^1\xi^7$, 1981 $\xi^2\rho$ 1987 ξ)。然而,新兴的后现代话语和辩论毕竟提出了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绝不能被简单地加以抛弃或轻而易举地将它们纳入到既定范式当中。

鉴于后现代争论非常广泛,我们打算详细说明并梳理出几种最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形式之间的差异,弄清它们的核心立场、观点以及局限。不过,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种立场之间连基本的一致性也没有。相反,通常被笼统地归并到一起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立场——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是冲突的——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人震惊。在那些接受了‘后现代’或被归属为‘后现代’的理论中,对‘后现代’概念的纷乱使用以及理论上的薄弱,也同样使人震惊。为了澄清后现代概念库中的一些关键词,有必要先来分辨一下现代话语和后现代话语之间的区别(参见 $To\xi^8\varphi\sigma^{67832}\sigma$, 1988)。

首先,我们也许应当在‘现代性’($^1\text{ }^3\rho\sigma^6\text{ }^2\chi^3$)和‘后现代性’($^4\text{ }^3\text{ }^7\text{ }^8\text{ }^1\text{ }^3\rho\sigma^6\text{ }^2\chi^3$)之间作出区分,前者用于描述现代时期,而后者则用于描述据说紧随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很多,今后讨论后现代性的话语亦将同样地多。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

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O\sigma^6 \ 1 \ \xi^2$, 1982)。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alpha \ 3 \ 9 \ 0 \ 1 \ \chi^2$, 1990)。

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不过,现代性的建构也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生产了一整套规戒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和控制模式合法化(参见我们在第二章中对福柯的讨论)。“启蒙的辩证法”($\Phi^3 \ 6 \ \omega \varphi \sigma \chi_1 \ \sigma^6 \ \xi^2 \ \rho \ \Xi \rho^3 \ 6 \ 2 \ 3$, 1972)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理性向其对立面转化,以及现

现代性的解放允诺掩盖其压迫与统治形式的过程。不过,现代性的捍卫者(Φξ₀σ₆¹ξ₇,1981,1987ξ和1987₀)却声称现代性有着“未充分实现的潜能”,拥有克服其自身局限和破坏性后果的资源。

然而,后现代理论家们却宣称:在当代高科技媒体(φψφ₈σπφ₁σρξ^ξ)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新社会的倡导者们声称,后现代性时代构成了一个新奇的历史阶段和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式,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代性的理论家如博德里拉(Οξ₉ρ₆χ₀ξ₆ρ)、利奥塔(∂₃38ξ₆ρ)、哈维(Φξ₆σ₃)等声称,诸如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等,正在产生着一种后现代社会形式。博德里拉和利奥塔把这些发展解释为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崭新类型,而杰姆逊(Ψ₁σ₇3₂)和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把后现代说成是资本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其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上的渗透和均质化(φ₃₁3υσ₂χ_ξξ₃₂)。这些过程同时也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碎裂(τ₆ξ_υ₁σ₂8ξ₈χ₃₂)、时空经验的改变以及经验、主体性和文化的新形式。这些条件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对这些状况的分析则提供了这样一些观点,凭借这些观点,后现代理论可以声称它处于当代理论发展的最前沿。

除了社会理论领域内这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差别外,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内,后现代话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里,争论围绕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而展开。^[2]在这些话语中,“现代主义”被用来描述现代时期的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后现代主义”则被用来描述那些出现于现代主义之

后并与之决裂的各种美学形式和美学实践。这些形式包括罗伯特·温图瑞($\rho_3 0 \sigma^6 8 \gamma \sigma^2 8 9 6 \chi$)和菲利浦·约翰逊($\phi \phi \chi \chi_1 \Psi^6 \varphi^2 7 3 2$)的建筑、约翰·凯奇($\Psi \varphi^2 \Pi \xi \nu \sigma$)的音乐体验、瓦侯($\delta \xi^6 \varphi^3 0$)和劳申伯($\rho \xi^9 7 \pi \varphi \sigma^2 0 \sigma^6 \nu$)的艺术、品钦($\phi^3 2 \pi \varphi^3 2$)和巴拉德($O \xi^0 0 \xi^6 \rho$)的小说以及诸如《快刀手》($O \xi \rho \sigma \rho_9 2 2 \sigma^6$)和《蓝丝绒》($O_9 \sigma \gamma \sigma^0 \sigma^8$)之类的电影。争论的核心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是否存在尖锐的实质性的区别,以及这些运动的相应成就和局限是什么。

后现代话语还出现在理论领域内,其重心集中在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和对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现代理论——从笛卡儿的哲学设计,经由启蒙运动,一直到孔德、马克思、韦伯及其他人的社会理论^[3]——因为试图找出知识的基础,因为它对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追求,因为它傲慢地宣称能够提供绝对真理,以及因为它的被认为是虚妄骗人的理性主义,而受到了批评。与此相反,现代理论的捍卫者们则对后现代理论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了攻击。

更具体地讲,后现代理论提出了对再现理论和那种认为理论只是对现实的镜像反映的现代信念的批判,转而采取了“视角主义的”($4 \sigma^6 7 4 \sigma \pi^8 \chi_0 \chi^8$)、“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中介。一些后现代理论因而拒斥那种为现代理论所钟爱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1 \xi \pi^6 3 4 \sigma^6 7 4 \sigma \pi^8 \chi_0 \sigma^7$),赞成微观理论($1 \chi \pi^6 3 8 \varphi \sigma^3 6 3$)和微观政治($1 \chi \pi^6 3 4 3 0 \chi^8 \chi \pi^7$)($\partial_3 3 8 \xi^6 \rho$, 1984 ξ)。后现代理论还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赞成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确定性。此外,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大多数现代理论所